

“经学与中国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陈锦宣

(四川师范大学 政治教育学院, 成都 610068)

2008年9月10-13日,由中国哲学史学会、四川师范大学、香港孔教学院、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台湾元智大学中国语文学系等单位共同举办的“经学与中国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师范大学举行。由于以“经学与中国哲学”为主题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此前尚未有过,此次会议的召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来自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等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100余人出席了此次盛会。会议共收到论文78篇,80多万字。与会的专家学者围绕此次会议的主题深入探讨了经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儒家经学的历史价值、现实意义及与现代社会的关系、儒家经学的发展演变史、儒家各派经学观、各时代思想家的经学思想等问题。

一 关于传统的经典诠释与现代重建问题

美国夏威夷大学成中英教授在以《论传统经学(体系)的哲学意涵与现代重建:儒学、经学与国学——兼评“经典诠释”的概念与方法问题》为题的大会发言中提出,儒学的发展是以易学的起源与发展为背景的,今天谈经学的哲学内涵的要义即在整合原典,结合经学中包含的古文学的整体化精神与今文学的专业化精神,同时面对现实与面对理想,扩大眼光,放开胸襟,吸收西学,展望未来,进行新的诠释,新的创造。他认为经学的现代重建有助于中华民族或中国发展其自身的国学,由此他提出了以易学为基础,融合儒学(经学)、子学和西学的中国国学的本体论建构模式。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文教授在提交给大会的论文《经典诠释的内在根据——论先秦诸子与六经的关系》中认为,《六经》作为先秦诸子所依傍的诠释文本,是由于它是中华文化的轴心,返本开新的依据。尽管先秦诸子之学百家争鸣,但“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故纵观、横观、合观先秦诸子之学所依傍文本的诠释特点,具有源头活水的一致性、核心话题的契合性、文本诠释的多样性、文本智慧的生命性、文本价值的开新性。这五个方面对诠释经典文本而言,具有普遍性。北京师范大学周桂钿教授对“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的命题加以重新诠释,指出六经注我,关键在于我和我的思维能力,我的思维接近道,才可能以六经注我。不知“道”的人以为哲学家可以随便胡说八道,那是误解。真正做到“六经注我”,是比“我注

六经”更难许多。中山大学杨海文先生论述了“以意逆志”的读书方法,认为孟子在批评“断章取义”的基础上所提出的解读《诗》篇的“以意逆志”,必然会聚焦于“逆”之一环,只有这样,“真切”就是对于“逆”最真切的“翻译”。于一般读者而言,践履“以意逆志”,理当放弃“中心”之类概念,让更有理解力度的“互动”概念挺身而出,使读者化身作者之后,终归要服从于自己的“集中意识”,这样“以意逆志”才会成为一种上乘的读书方法,更是一种心向往之但又未必能够抵达的解释学境界。

二 关于经学的义理化

华东师范大学杨国荣教授在的大会发言中指出,经学既是一个文献的系统,又是一门义理阐发之学,经学一开始就具有了意识形态的性质以及展开了的一套价值系统和规范体系,同时也包含着对这套价值系统和规范体系的理论论证。理学无疑也体现了经学的内在精神,同时,理学思想阐发首先也是沿着传统经学而展开的。相对于两汉经学,理学的特点具体表现在它更注重从形而上的层面上展开对经学的研究和阐发。中国人民大学向世陵教授则从文献的角度分析了宋代代理学兴起的经典根据,认为理学道统论的文献根据不能仅仅停留在《论语》和《尚书》上面,必须要有所超越,需要将视野投向儒家的另一部经典《周易》上来,认为易学的道统论不但与《论语》和《尚书》对立,反而正是对它们的恰当发明和理论上的支持,关键的论据就在中道上。四川师范大学蔡方鹿教授讨论了宋明理学的经学观,认为以己意说经,不受旧注疏的约束,体现了宋明理学各派经学观的共性;在此基础上,程朱重视“由经穷理”、我注“四书”,陆王强调以经书为吾心的注脚,但就形式与解经的目的即理学家的思想实质而言,理学各派均是把经学形式与性理学内涵相结合,说经的目的在于阐发自己的性理、心性之学,而不是为解经而解经。

三 关于传统经典的进一步研究与考证

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探讨了《周礼·地官·司徒》、《礼记·王制》中有关社会公正的论述,指出这两部经典中有关应对灾荒、瘟疫,予以组织化救治的制度,有关对老弱病残、鳏寡孤独、贫困者等社会弱者的尊重与优待的制度,有关颁

职事及居处、土地、赋税、商业的制度与政策中对老百姓权利与福祉的一定程度的关注与保证等,都涉及到今天所谓社会公平公正的问题,体现了中国先民的原始人道主义,体现了中华民族以“仁爱”为核心的价值系统与人文精神。其中有些成果值得我们重视,还有进一步做创造性转化的价值与意义。韩国成均馆大学金圣基教授在发言中着重探讨易经哲学中吉凶观念的演变与人的自律扩大,认为易经哲学在殷周时期重卜筮不重义理,春秋时期则重义理而不重其占,通过分析卦爻辞中的占断观念,指出《易传》中占筮思想是脱命定期,吉凶观念之道德转化——吉凶由人,并进而提出《易传》“吉凶”观念之终极关怀在于完全脱离出“命定”的祸福概念之迷。苏州大学蒋国保教授对汉儒称“儒学”为“儒术”作了考证,通过对“儒学”、“儒术”概念之衍变历史的梳理,认为在汉代,“术”化儒家思想,将儒家思想由重“道”转向重“术”,是时代对儒家的要求,汉儒之所以称“儒学”为“儒术”,与这一特定时代要求有密切的内在关联。中国社科院刘丰先生论述了《周礼》的成书与战国时代的社会变革,认为《周礼》并非历史实录,而是一部理想的政典,是一部战国时代的著作,典型地体现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征。《周礼》作为战国时期一些儒家学者对于国家体制的制度安排,只有把它放在战国那样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才能显示出它的历史意义与价值。日本东京学艺大学井之口哲也先生考察了白虎观会议的意义,通过确定在东汉时期进行的各种大小规模的统一经的语句或者经义的事业的历史开展,纠正以往的各种论点的偏颇,探索“正定”这一个事业在经学上的意义,认为将白虎观会议的举行及熹平石经的建立定位为东汉时期断断续续进行的经义、经文的“正定”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妥当的,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后世研究者不应该过分夸大它们的作用。

四 关于对传统人物的个案研究

陆贾、阮籍、嵇康、张载、李贽、罗念庵、方以智、全祖望、龚自珍、廖平、刘师培、李源澄等人的经学思想成为与会学者的探讨热点。

重庆师范大学李禹阶教授对汉初思想家陆贾的新儒家理论做了探讨,认为陆贾有鉴于秦灭亡的教训,提出了以儒家“仁”、“礼”思想为主体构建“治道”,其“天人感应”的本体论观点,大一统君道与“圣”、“君”合一的思想,“经以致用”的历史观与方法论,德刑相兼、先德后刑的施政观等,对汉初叶经学的形成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曾春海教授由汉魏之际的经学流变脉络出发,论述了阮籍、嵇康对经学的继承和批判,认为两人经历了早期对经学的肯定和抱负到对经学的严厉批评和扬弃的过程。并指出阮籍与嵇康所反对、扬弃的经学,是两汉以来以经学为工具,卖弄学问,标榜自己以沽名钓誉,贪求个人利禄而毫无真儒之志气

与操守。阮籍、嵇康不齿把儒家经学这套道德理性价值的生命学问异化成遂行个人私欲的“工具理性”极度扭曲、践踏了经学的真正内在价值。陕西师范大学林乐昌教授专述了张载的经学思想体系,认为张载经学思想特色在于:(一)“志于道”、“发源端本”的道统思想;(二)“心解则求义自明”的解经方式;(三)“某唱此绝学亦辄欲成一次第”的体系建构。并认为“太虚”、“气化”的宇宙论哲学,“合虚与气”、“合性与知觉”的心性论哲学和“圣学须专礼法修”的礼学思想构成了张载经学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台湾“中央研究院”钟彩钧教授对罗念庵的经学进行研究,主要探讨其易学与礼学两个方面,认为从经学的方法、义例、传统上看,罗念庵的经学达到了当时的一般水平,但从更重要的思想的角度看,他不愧是江右王门巨子,他的经学,不论作为修己之学,或作为解决时代问题的工具,都提出了活泼而深刻的见解。台湾元智大学詹海云教授对全祖望《经史问答》中四书学作了探讨,认为全祖望四书学的特色在于:(一)重名物、制度和地理;(二)融史学于理学、经学:事上求理,证之客观事实与人情物理;(三)重视时措之宜与应物无穷;(四)在考据方面,不为无用之小考据及来源多方,而没有办法证明者;(五)不轻信,不轻疑,尤其体现在朱子学上面。四川师范大学黄开国教授对龚自珍经学作出评价,认为梁启超、章太炎、钱穆及其今人对龚自珍经学的定位,都不是准确的定位。他提出龚自珍的经学绝不是人们“公认”的今文经学,应该将龚自珍的经学与其整个思想相区分,并将其经学分为思想与学问两大内容,才可以对龚自珍经学的特色与价值做出正确的评判。他指出在历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是龚自珍经学的思想内容,而不是学问的部分。

五 关于经学研究的现代价值、与现代社会的关系和如何发展经学

澳大利亚汉学家李瑞智(Reg Little)先生在大会发言中指出,面对再现与重塑文化传统的挑战以及解决过去两个世纪英美全球化进程中遗留下来的许多问题,儒家思想总是能提供一种有价值的智慧。运用这些智慧,儒家共同体能不同寻常地解决一些全球性的问题。即便在对《论语》的传统思想力量的认识方面,也可以反映出西方读者在寻求理解中国经学并将其作为当代成功的指南时所面临的困难。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论的世界里,儒家传统思想面临的最大挑战也许是需要发掘出其本身合乎科学原则的经验和价值,以用来解决和纠正具有过分破坏性的欧洲启蒙科学思想施加于人和自然环境诸多伤害的问题。在如何发展经学问题上,清华大学彭林教授在会议论文中提出复兴经学亟待解决三个问题:一是要成立经学系,二是要重建经学研究的课程体系,三是要培养专经研究的青年才俊。

第三届中国地域文化与语言国际学术会议 暨韩国汉阳大学、中国四川师范大学学术交流会综述

赵乖勋, 陈绪平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成都 610068)

2008年10月19-20日,由中国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和韩国汉阳大学中文系BK21研究组联合举办的第三届中国地域文化与语言国际学术会议暨韩国汉阳大学、中国四川师范大学学术交流会在四川师范大学召开。大会分为四场教师学术交流会、两场研究生交流会和两场讨论会,百余名专家学者共聚一堂,交流学术论文30余篇,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19日上午举行的开幕式由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唐小林教授主持,副校长张健教授、文学院院长李诚教授致欢迎辞,汉阳大学汉语教育委员会会长李光哲教授、中文系BK21研究组组长严翼相教授致答谢辞。四川师范大学科研处处长李树勇教授、庾光蓉副处长,文科学报主编李大明教授,文学院王小盾教授出席了大会。韩国汉阳大学教授李光哲、严翼相、吴秀卿、梁世旭,博士研究生金美(厦门大学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刘泽民,浙江大学教授孙敏强,四川师范大学教授万光治、段渝、吴明贤、熊良智、房锐、周及徐、黄尚军先后作了大会发言。四川师范大学和汉阳大学的研究生代表也在讨论中发表了各自的观点。

与会专家学者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深入讨论,进行学术交流。

一、充分利用中韩两国相关文献开展研究,促进学术交流的进一步发展。韩国研究者称受韩愈《毛颖传》和苏轼《万石君罗文传》等作品体式影响而产生的传体寓言小说为“假传体”寓言。孙敏强认为此类作品定名为传体寓言更妥当,其源头应是先秦以拟人化的动物或其它事物为主角的寓言。严翼相探究了成都方言和韩汉语类相似度,结果表明二者语音类相似度在中国所有方言中处于平均值。房锐提出韩国高丽时期编辑的唐诗选集《夹注名贤十抄诗》中有百余首佚诗,它们为研究晚唐五代时期巴蜀作家及文学生存状态提供了重要史料。梁世旭介绍了韩语中使用汉语借词的现状,阐述了汉语借词的特征,认为汉语对韩语的影响很大。四川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汤洪分析了《离骚》中的词语反映的中外文化交流情况,汉阳大学研究生李贤景探讨了外国商标名译

为汉语的方法。

二、多角度探讨巴蜀文化的丰富内涵,展现其独特魅力。万光治在校注四川民歌长篇叙事歌谣《逍遥记》的基础上讨论了该作品的主题、风格、结构、传播特点及其意义。吴明贤认为巴蜀文化具有包容性、创造性和叛逆性,这些特点影响了唐代四川作家。段渝证实,中国有一条“南方丝绸之路”,它分东西两路:西路从成都出发,经缅甸、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到中、西亚;东路由成都经云南出境,通过红河到东南亚。黄尚军、曾志探讨了成都北郊新都客家话的分布、词汇特点及其演变。金美认为,贵阳方言和重庆方言中疑问代词具有较大的一致性。吴秀卿以老虎信仰为例,阐述了中国地域文化的丰富性。四川师范大学研究生董红明初步探讨了巴蜀孝节牌坊,张琪搜集了四川省屏北县薨草歌,罗亮星从文化角度评析了四川东北地区葬仪音乐,王晓先初步分析了四川省新津话的语音特点。汉阳大学研究生钱有用考证了汉语方言词语“家来”、“家去”的用法及成因。

三、深入具体的学术讨论进一步促进了相关领域研究的发展。李光哲从用典的角度证实谢灵运诗“其源出于陈思”、曹植诗“其源出于国风”的说法完全正确。针对现代一些学者对扬雄著《蜀都赋》提出的质疑,熊良智从文献和创作两方面指出扬雄《蜀都赋》并非伪作。周及徐论述了老子、孔子思想的对立及其产生的社会基础,认为前者较为原始的部落制农业社会为其产生基础,后者以等级制农业社会为基础形成,这是二者对立的根源。刘泽民阐述了汉语官话方言入声字的归派,进一步追溯了入声调在各方言中的历史演变。四川师范大学研究生陈勇认为《全唐文》所录的《代高骈回云南牒》有误,汉阳大学研究生徐铢敏证明剧本《缀白裘》来源于传记《八义记》,金有花从音韵的角度分析了/ai/、/au/中/a/稳定性较弱的原因。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本次会议进一步增进了两国学者在相关领域的学术交流与了解,并为今后定期交流机制的建立提供了借鉴。双方愿意为此做出进一步的努力。

(责任编辑:唐 普)